



达尔文论学

上卷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

上卷

辛未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ОЧЕРКИ ГОГОЛЕВ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3 年版本译出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

上 卷

车尔尼雪夫斯基著

辛未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8.25 插页 2 字数 403,000

1978 年 11 月第 1 版 197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内精装 1,000 册)

(原上海文艺版)

平装定价: 1.85 元 精装定价: 2.30 元

书号: 10188·49

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谈到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时指出，“读者如果想要稍微具体地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请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七十年代的那一群光辉的革命家；……”

列宁所以把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作社会主义先驱，这决不是偶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认为，作为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具有无比强大的威力和全世界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并不抛弃过去时代所取得的珍贵成就，而是吸收和改造两千多年以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所获得的全部有价值的东西。以彻底推翻沙皇农奴制度、积极宣传农民革命、在国内实行社会主义(当然，还停留在空想社会主义阶段)为中心内容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毫无疑问，应该在过去时代先进思想中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作为社会主义先驱之一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他是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批评家，作家。他的一生都是尽瘁于对残酷的沙皇进行坚决而无情的斗争的。不论在萨拉托夫的学校里，不论在《同时代人》杂志的编辑部中，不论在流放中，不论在释放以

后的余生中，他都坚持了顽强的战斗。他的学识是十分渊博的，无论是哲学、社会学、经济学，还是历史学……在他所处的时期和环境里，他都达到了杰出的成就。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在“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到对农奴制及其残余进行斗争”的时期，是在俄国军队在克里米亚一战一败涂地因而明显地暴露出农奴制君主专制腐朽没落的时期，是在关于消灭资产阶级—地主所有制并且完全推翻沙皇政权的思想日益深入群众的时期展开活动的。就在这个复杂、艰苦的时期，车尔尼雪夫斯基表现了清新的智慧、惊人的洞察力，对于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坚定。他是坚决站在俄国人民一边的伟大的革命者。

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八二八年七月十二日(新历二十四日)生在伏尔加河畔萨拉托夫城的一个司祭长家里。萨拉托夫在当时还是一个风气闭塞的城市。据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回忆：“当我已经是一个并不怎样幼小的孩子的时候，每年冬天，从萨拉托夫渡河到波高罗夫村去，还会发生狼噬害行人的事情……而当我已经是一个大孩子的时候，站在自己家里的院子里，还能够听到狼群在伏尔加河对岸嗥叫的声音哩。”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父亲加富里尔·伊凡诺维奇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对于儿子的教育是很注意的。尽管他在教会里的工作很多，但还是能够挤出时间来，教孩子们学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他当过神学校的教师，很有一些教书的经验。他能够流畅地阅读希腊和拉丁文古典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后来能够把

拉丁语说得很流畅，就是出于他父亲的教导。和不安的、多病的母亲要求严格的爱不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父亲对待儿子总是努力不去束缚他的自由。作父亲的善于工作的才能，多方面的修养，内在的毅力，在儿子身上，不但得到了继承，而且还大大得到发展。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父亲藏书是相当丰富的，有许多书车尔尼雪夫斯基很早就已经读过：卡拉姆静的《俄国国家史》，泼留沙尔的《百科大辞典》，普希金、茹柯夫斯基、果戈理的作品等等。他的亲戚拉耶夫曾经回忆说：“你简直很难看到他的手里不拿着书；他在早餐、午饭，甚至是谈话的时候总是手不释卷。父亲书房中的各种各样的书他都读过。……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读书的热情是惊人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十岁时候，他的知识的广博和多样，只有中等学校十五岁的学生才能和他相比。”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一八三六年进教会小学，一八四二年进萨拉托夫教会中学。这些教会办的学校很少给他什么东西。尤其是小学办得更糟，车尔尼雪夫斯基只是形式上把姓名登入学校的名册，同时却有一个口头协定，他可以不去学校，在家里学习，只需要参加考试。按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发展和水平来说，他早就远远超出学校所要求于学生的了。教会学校陈腐的教材，烦琐死板的教学方法，只不过剥夺掉他一些时间。他后来这样议论道：“甚至那些在智力上并不超过普通才能水平的学生……都不能不对教会学校表示嫌恶。”

车尔尼雪夫斯基很早就获得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他注意地、敏感地看着周围的一切。他清醒地看到了人间的不平。在伏尔加河沿岸散居着拉纤夫和码头工人的帐幕，他们的悲惨的生活

随时都映入他的眼帘。地主压迫农奴，沙皇拉壮丁，萨拉托夫城的虎疫，饥荒，专制制度所种下的粗野无知、迷信、偏见，这些都

在他的脑子里留下沉重的印象。他努力在书本中找寻一切问题的解答。他在中学时期就爱好发表在《祖国纪事》上的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的文章。他们的见解对他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十分深远和巨大的影响。

在教会中学毕业以后，他说服了父亲和母亲，不再向教会方面发展，他终于在一八四六年离开萨拉托夫前往彼得堡。这年夏天他顺利地考进了彼得堡大学哲学系历史、语言专业。他抱着巨大的热情以及青年人特有的清新精神专心致志地埋头学习。他研究了历史学、哲学、经济学、俄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甚至还旁及于工程技术。另一方面，政治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他的注意。在他大学求学的年代里，国内国外的政治生活中正充满着巨大的事件。进步青年们密切地注视着一八四八年西欧的革命事件，注视着人民大众反对封建残余，反对卑鄙无耻的资产阶级的斗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所有同情都在革命大众的一边。他的革命思想就是在大学时代渐次形成的。

就在这时候，他认识了革命诗人米哈伊洛夫，还有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哈内科夫。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是一个以平民知识分子活动家为主要成员的小团体，他们是激烈反对沙皇政府的。但这个团体并没有坚定的行动纲领。有的人主张施用和平宣传手段，有的人认为必须进行革命斗争。悲愤地叫出“我的祖国套着镣铐”的哈内科夫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信徒。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同哈内科夫的交谈中，在阅读哈内科夫借给他看的哲学著作中，认识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同时也接触了孔

德的实证哲学和黑格尔的体系，还有费尔巴哈的著作。年青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的深刻和独立，促使他没有去屈从随便哪一种学说，而是有所选择的。他最初对于黑格尔体系表示过向往，但很快就发现这个体系的原则跟结论之间深刻的矛盾；他看出在傅立叶的“法郎吉”中包容着美好的思想，但是他也发现这种学说中的缺点和局限性。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哈内科夫之间的友谊还来不及深入和巩固，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没有成为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一员，沙皇反动当局就动手逮捕参加这个团体的全体人员了，哈内科夫也没有幸免。

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大学时代所渐次形成的革命思想不但并没有因此削弱，相反，只有更加坚定。他愤慨地表示：“就让一个阶级动手来压迫另一个阶级吧，那时候就会有斗争，那时候被压迫者就会认识：他们在既存的事物秩序下是受着压迫的……我不可抑制地等待着革命，渴求着革命……”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一八五〇年，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一八五一年，他回到故乡萨拉托夫，在中学里教文学。他本来打算留在彼得堡，做一个评论家，象别林斯基似的，但是因为他早就申请过要回乡任教，而且他所提出的作为延宕借口的条件也被采纳了，就不得不回来。中学的环境原是十分停滞、保守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第一次使清新的空气冲破这充满霉味的气氛：他以令人神往的生动的谈话，对俄国文学优秀作品作详细的分析，代替了陈腐的教材；他启发学生开动脑筋，培养他们广泛地了解生活和科学问题，能够独立思考。有一个学生这样回忆说：“从他担任教师以来，文学课中的死读硬背就停止了，而让生动的言

论和思想得到了发挥。然而最使我们震惊的，就是他那生动的、使我们都能了解的语言，然后是对我们的人格之尊敬……”大家都迫不及待地盼望他的课。每逢下课回家的时候，总有许多学生伴他同走，他好象慈父对待孩子们似的，跟他们亲切地谈话。这样做，自然大遭专横顽固的人们的妒忌，特别是校长。校长时常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教室去旁听，有时，他听得不耐烦了，就打断说：“你问问学生的功课吧。”车尔尼雪夫斯基回答：“我还没有解释完呢。等我解释完了，再问您指定的学生的功课。”于是这位校长只好悻悻然走出去。有一次，当这位校长又走进他的教室时，讲课就倏地停顿了。

“您这是干什么？”校长问。

“不能再讲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冷冷地回答道，“疲倦啦，学生也疲倦啦；得让他们休息一会儿……”

恼羞成怒的校长从此就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看作眼中钉，到处诉说他在学校里宣传革命。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就离开了学校。

一八五三年，他同一个医生的女儿奥尔加·索克拉托夫娜·华西里耶娃结婚。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对待他的妻子的态度上，也十分显明地表达了他的百折不回献身革命的精神。他在开始向华西里耶娃表白感情的时候，就预言他的一生将要献给革命，而为了反对沙皇，他迟早总会被他们逮捕。他曾经这样说：“要把另外什么人的生命跟自己的生命联结在一起，在我看来是卑鄙和可耻的，因为我并不相信，我能够长久地享受生命和自由。我的想法就是这样的：我应当时时刻刻等待，终于来了宪兵，把我弄到彼得堡，

让我坐牢，天知道，要坐多少时间……我不能摆脱这种想法，因为它就在我的性格里生根，我的性格是激烈的，我看不惯我在周围看到的一切东西。”

华西里耶娃丝毫都不改变她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态度，相反，却是勇敢地准备共同承受这个伟大革命家的命运。

婚后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母亲去世了，他就和妻子一起到彼得堡。内地的教书生涯在他已经感到逼窄了，不能使他的革命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他打算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发挥力量，投入到他渴望已久的杂志和文学活动中去。但是到了彼得堡以后，最初，他不得不在陆军学校教教书。他的《艺术对现实的美学关系》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这是一篇学位论文。这篇论文基本部分写成以后，他先送给一个肯定过这个题目的教授看。这个教授一时看不出论文中激烈的论争倾向，觉得没有什么“危险”，只劝他把批评唯心论美学的地方改得和缓一点，用含混的字眼来代替黑格尔这个姓。可是过了一些时候，车尔尼雪夫斯基再把定稿送给他看，他却发现这个年青学者所发挥的思想是和传统的解释大不相同的，就害怕起来了。以后学校当局就找出种种借口，拖延着不开辩论会，直至两年以后。

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并不因此而气馁，他继续他的活动。他开始向《祖国纪事》与《同时代人》两杂志投稿。《祖国纪事》当时是由一个叫做卡拉叶夫斯基的人主编的，已经完全不象以前有别林斯基参加时那么充满战斗气息，相反却采取自由主义的、保守的立场。他们并不重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因此他的著作发表得不多，而且只限于一些学术性的专题研究，这使他不得不再向《同时代人》投稿。《同时代人》当时还保持着别林斯基的

精神，正由大诗人涅克拉索夫任主编。一八五三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认识了涅克拉索夫，涅克拉索夫凭着他编辑工作上的敏锐的观察力，单单根据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第一篇书评，就猜到可以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身上找到别林斯基批评传统的继承人。《同时代人》的批评与图书评论栏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前，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涅克拉索夫一见到他，就对他十分亲切，要他马上参加编辑工作。还对他这样说：“为什么您找上巴那耶夫，而不来找我？您因此就浪费了两天时间。”

由于涅克拉索夫的信任，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但参加了杂志的编辑工作，发表了许多论文和书评，而且他很快就在杂志编辑部中占据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最后，还影响到杂志的方向。

车尔尼雪夫斯基最初在《同时代人》发表的是关于文艺问题的批评文章。其中如《论批评中的坦率精神》、论阿甫杰耶夫的长篇小说、论叶甫盖尼·屠尔夫人的《生活的三个时期》以及论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贫非罪》等。这些文章一发表，就遭到《祖国纪事》杂志的攻击。他在这些批评文章中，继续贯彻了别林斯基的传统，树立了文艺批评的楷模。他指出，“俄国批评不应当效尤法国小品文作家那种琐碎的、细微的、模棱两可而且空洞的批评”，他说，“这种模棱两可和卑微琐碎不符合俄国公众的口味，无法达到我们的公众十分公正地要求批评所具有的生动而明确的信念。”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无情地指斥象叶甫盖尼·屠尔夫人那样的作品缺乏思想性、缺乏富有社会意义的内容，描写了不是长篇小说内容本身所需要的东西；批判小说作家阿甫杰耶夫想把一切丑恶和粗野的东西理想化，想把地主的寄生、荒淫的生活理想化。而在论《贫非罪》一剧时，因为作品中所暴露出来的

VIII

妥协调和的倾向，车尔尼雪夫斯基更揭露了反动的斯拉夫派的理念对奥斯特罗夫斯基所起的有害影响。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最初一批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战斗的革命立场，尖锐、严厉的批判精神，自然引起反动的作家和批评家猛烈的回击。甚至有几个也是《同时代人》杂志同人的自由主义作家，也对他深为不满。有一位回忆录作家说：《同时代人》的许多有威望的同人，久久不知道，是谁在这本杂志中发表批评与书评文章。当屠格涅夫、鲍特金等人要涅克拉索夫说明的时候，涅克拉索夫总是避免作正面回答，因此新的同人的名字一时竟没有人知道。有一次，鲍特金固执地盘问诗人：“涅克拉索夫，人家说你是从中学校里挖掘到你的批评家的？”——“挖掘？”涅克拉索夫回答，“这是我的事情。”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千方百计想拆散他和涅克拉索夫之间的联合，迫使他离开杂志，但是涅克拉索夫并没有因此而动摇。在一次出国疗养的机会，涅克拉索夫索性把杂志的编辑工作都交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管了。这个决定对《同时代人》的自由主义者同人是一种巨大的刺激。车尔尼雪夫斯基深知处境的困难，他一方面尽力坚持杂志的基本倾向，一方面竭力防止象屠格涅夫、列甫·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受到反动批评的影响，努力把他們团结好。

广大俄国读者是拥护《同时代人》这种革新倾向的，杂志的销数增加了。许多新的作家、理论家如杜勃罗留波夫、萨尔蒂柯夫—谢德林、米哈尔科夫等人也逐渐团结到杂志的周围来。尤其是杜勃罗留波夫的加入。

一八五五年五月，车尔尼雪夫斯基那篇拖了两年多的学位论文《艺术对现实的美学关系》终于得到辩护的机会了。在辩论

会进行的一天，拥挤着许多听众，其中有不少学生、军官和青年文官。有的人不得不站到窗台上。反驳的人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这篇论文若干无可争辩的优点，一方面却竭力想要推翻它的哲学基础，而袒护现存美学理论所制定的艺术的“不可动摇的目的”。但是所有这些反驳意见，没有一点是超过已经被作者在论文中加以彻底否定的论点范围的，他很轻易地就把这些反驳意见都驳倒了。在辩论结束之后，担任主席的大学校长普列特涅夫对他说：“我在讲课时向你们讲的，好象完全不是这样的呵！”

这一伙人虽然无法驳倒这篇学位论文中的论点，但还是拖着不作决定，把论文束诸高阁。

然而他们无法封闭论文中所表达的进步思想的传播。这篇论文在辩论会召开之前就印过四百本。在公众中间引起了巨大的兴趣。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论文中逐条驳倒了从柏罗提那到康德和黑格尔为止始终纠缠在从宗教上来解释美的概念的唯心论美学。他指出“美是生活”，“美”应该理解作客观现实的属性，在艺术作品中不会有这种现实所不能提供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只断言现实的美是超过艺术的美的，不只是断言美这个概念在不同人们、不同阶层、不同阶级的心目中并非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也还指出了艺术的积极的改造作用。

车尔尼雪夫斯基另一部理论著作，《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也在这一年开始发表。此后他又陆续发表了论谢德林《外省散记》、论列甫·托尔斯泰的作品、论屠格涅夫的作品评论文章。他在评析谢德林的《外省散记》时，把艺术批评与社会批评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阐明推动谢德林的人物所以从事偷盗、受贿、欺诈的原因，他指出这些罪恶的根源不在人们个人的本性，

个人的性格特征，而应该“消除令人毁灭的环境，使人的智慧灿烂放光，使人的性格变得美好起来”。他在分析托尔斯泰的《幼年、少年、青年》时，批判了自由主义作家德鲁日宁强把托尔斯泰拉作自己所信奉的为艺术而艺术论的代表、硬说托尔斯泰的作品没有“受到任何一种思想的影响”的荒谬论点。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托尔斯泰是把新的东西带进了俄国文学的，是揭露了当时的社会倾向的。而在分析屠格涅夫的《阿西雅》时，他也能通过《阿西雅》中的主人公和罗亭、别尔托夫（赫尔岑《谁之罪？》中的主人公）的对比，勾勒了俄国自由主义者的嘴脸，揭露所谓“有教养社会”全部生活的真相。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一八五七年杜勃罗留波夫加入《同时代人》阵营以后，就把《同时代人》杂志的文艺批评与书评栏交给了杜勃罗留波夫负责，自己则致力于写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文章，如《资本与劳动》（一八六〇年）、《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则》（一八六〇年）等等。在《资本与劳动》中，作者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阐明了自己的经济学说的基本原理。他称这个学说是“劳动人民的经济理论”。而《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则》，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专门探讨哲学问题的卓越的长篇论文。这篇长文对唯物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对反对唯心主义和僧侣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篇长文深刻地批判了折衷主义的哲学观点，阐明了战斗的哲学唯物主义的观点。沙皇的书报检查机构认为这是一篇“动摇君主政权基本原则、绝对法律的意义、夫妇的家庭天职、人的精神方面，以及煽动一个阶级仇恨另一阶级”的文章。他们对放过这类文章的检查人员还作了惩处。

一八五九年六月，车尔尼雪夫斯基曾作伦敦之行，与当时已

经侨居英国的赫尔岑会晤，向赫尔岑解释《同时代人》的立场。

《同时代人》杂志由于不断发表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涅克拉索夫的诗歌，萨尔蒂柯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等等，深得俄国读者的欢迎。刊物销数日益增加。

同时，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周围，也团结了一批愿意把力量贡献给革命的优秀人物。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人们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帮助乌克兰诗人谢甫琴柯在描写困苦无告的农奴的命运时找到鲜明的色彩；他鼓励诗人米哈伊洛夫认识进行实际宣传活动的必要性，推动他同谢尔古诺夫一起写出著名的以号召发动政治斗争为结束语的《给青年一代书》；他还打消波兰革命家谢拉柯夫斯基认为可以在保持专制政体之下进行社会、政治改革的幻想。

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家去的人很多。有军人，有大学生，有文学家，也有学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妻子奥尔加·索克拉托夫娜善于掩护她的丈夫同革命青年的秘密会见。她经常使这种会见添上一种既有跳舞、又有歌唱的晚会色彩。

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真正的革命家和杰出的秘密活动家，他并不以响亮的辞句自我标榜，而是锲而不舍地、目光锐利地观察着每个新来的人，努力弄清楚这个人参加革命运动的思想认识如何，决心究竟如何。只有在他把某个新相识者完全弄清楚以后，他才同这个人真正接近起来，并对这人表示信任。有一个访问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大学生这样说：当你同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谈话的时候，你会感到，他不但知道你脑门里的东西，而且还知道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

《同时代人》杂志的巨大影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活动，自然

引起沙皇反动统治集团很大的不安。而其时沙皇当局所精心串演的“农奴解放”的大骗局又不但瞒不过人民，而且激起了越来越多的暴动。在这种形势下，沙皇就急忙采取血腥镇压的政策。他们派遣一个叫柯斯托马罗夫的特务，借口向《同时代人》投寄翻译诗稿为名，混到杂志的作者队伍中，从内部进行破坏；他们又要秘密警察监视车尔尼雪夫斯基家的活动；还唆使御用文人卡特柯夫一伙人在《俄罗斯通报》上制造舆论，叫喊什么“为了公共的安宁，把我们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祸害里解救出来吧”；接着又命令《同时代人》停刊八个月，最后，就悍然不顾地把他逮捕了。

经过两年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的囚禁，车尔尼雪夫斯基才被沙皇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决褫夺一切公权，放逐到西伯利亚矿山作七年苦役。在放逐之前，沙皇反动政权为了摧毁这个坚强不屈的革命预言者的人格和威望，还无耻地在梅特宁广场上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串演了一次“假死刑”的丑剧，把他绑在行刑坛的木柱上，脖子上挂着牌子。但是这种凌辱性的刑罚，不但丝毫不能减低人们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尊敬，而且激起了人们对沙皇反动派更大的憎恨和愤怒。许多人拥到广场上来，当场把一束束花扔到这个被绑缚的普罗米修斯身上去。

后来，赫尔岑也在《警钟》上发表了强烈的控诉。

一八六四年七月，车尔尼雪夫斯基给押送到伊尔库茨克盐场作苦役。八月又转到卡达伊矿山，到一八六六年九月，又被转送到亚历山大工场。在一八七一年有一个和马克思认识的革命家赫尔曼·洛伯丁曾经从国外赶回来，打算营救他；但因为不知道他的确切流放地点，在伊尔库茨克滞留下来。不久，洛伯丁

被沙皇密探所发觉，终于被逮捕。沙皇反动政府害怕人民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深切的同情，又看到革命家们几次三番想救他出去，他在流放中还能对一些接近的人起直接的影响，因此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七年苦役期满之后，一方面延长他的苦役期限，一方面又把他转送到维留斯克。这个维留斯克照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的话说，是一个连“村子”的意义都够不上的城市，它一共只有二十来所俄国式房屋和少数雅库特人的帐幕，一年只有四个月是可以和外界相通的。

在延长苦役期间，沙皇反动当局曾经派了一个人来看望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他说：他是奉总督之命来的，他有没有什么申诉的，需不需要什么东西。

“谢谢你，”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凳上站起来说，“我看来什么都很满意，没有什么要求。”

来使慌忙要他仍旧坐下，说是他对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讲，接着递给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张纸，要他读一遍，然后作出肯定的答复。

车尔尼雪夫斯基拿过这张纸，读了一遍，就说：

“谢谢你，可是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要请求宽恕呢？这是个问题。我觉得，所以把我流放，是因为我的头脑跟宪兵头子舒瓦洛夫的头脑的构造不一样，关于这一点难道是可以请求宽恕的吗？谢谢你的劳驾。我坚决拒绝请求宽恕。”

总之，囚禁，流放，苦役，维留斯克的“孤岛”都不能摧折这个伟大革命家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意志。而且，他即使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他都尽量利用一切可能来进行文学和学术活动。他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中完成了长篇小说《怎么办？》，在西